

呼唤

1998 年—2007 年言论选本

第三册



刘鹤守 编

呼 唤

1998 年—2007 年言论选本

第三册

刘鹤守 编

校友自阅资料·非卖品
选自国内公开发行出版物

呼唤——1998年—2007年言论选本
第三册(全五册附选文完整文本光碟)

刘鹤守 编

2008年11月印刷

有关本书事宜,可向编者查询:

通讯处:210014 南京东郊卫岗美林苑 1-301 信箱

电话:025-84271282

E-mail: Liuhejie1944@163.com

目 录

《呼唤——1998 年—2007 年言论选本》第三册

2003 年卷

何家栋	20 世纪中国的“新道统” ——从梁启超到李慎之(选录)	1
王元化	仍然有很长的路要走	7
萧雪慧	关于人权的几个理论问题的探索 ——纪念《世界人权宣言》发表 50 周年(选段)	11
朱学勤	简论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观念转变(有删节)	16
傅国涌	“文人论政”:一个已中断的传统(选段)	26
钟沛璋	“以俄为师”得失的探讨(有删节)	32
高 华	王永治 毛泽东是重大的历史现象 ——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高华答《凤凰周刊》问	41
傅国涌	1944 年:一个新闻记者眼中的延安 ——重读赵超构《延安一月》	47
单世联	九死一生如昨 ——《革命人》自序	53
章诒和	最后的贵族 ——康同璧母女之印象(选段)	59
夏 榆	说真话的吴祖光	66

李 锐	王永治“我的建议,老中青三代普遍赞成” ——本报独家专访毛泽东前秘书李锐	74
樊百华	也说“苏丹化”危险	82
于建嵘	权力与资本、知识的联盟和工农边缘化	88
秦 晖	中国转轨之路的前景(选段)	91
资中筠	“非典”与“五四”精神(有删节)	99
秦伯益	人民不会忘记蒋彦永	104
余世存	中国公民在行动	108
秦 晖	以强凌弱,于国何福? 于民何利?	111
王 怡	“民权运动”:距离我们只有一公分	118
陈桂棣	春 桃 漫漫上访路 ——《中国农民调查》选章(摘要)	123
秦 晖	并税式改革与“黄宗羲定律”(有删节)	129
童大焕	“明星村”的路能走多远	133
胡 伟	《走向共和》的启示	137
魏明伦	劝君少刺秦始皇 ——评点《英雄》	140
郝 建	这个人,那条狗	143
周 实	鱼与熊掌 A	148

2004 年卷

丁 东	谢 泳 高增德 赵 诚 智效民 90年代以来 的学人与思潮(概要)	155
王 怡	从民权到民主 自由主义的渐进思路	158
狄 马	天赋人权与人赋人权(选段)	163
邵燕祥	愧对马克思(有删节)	167
黄一龙	“两类矛盾”随想	174

范 泓	殷海光其人其事(有删节)	178
赵 凌	逝者杨小凯(有删节)	184
袁伟时	评《甲申文化宣言》	192
徐宗懋	现代中国的饥荒图(选段)	201
李 洁	吴佩孚的复杂人生(有删节)	204
张耀杰	许德珩的释放与营救	214
智效民	决策筹边仗此人 ——也谈《玉门出塞》(有删节)	217
杨奎松	共产国际为中共提供财政援助情况之考察(概要) ..	223
任东来	中俄秘档里的朝鲜战争 ——读《毛泽东、斯大林与朝鲜战争》(选录)	227
郭慕岳	1952 年在清华(有删节)	233
李冰封	“文革”的准备阶段当始于 1963 年	240
高尔泰	幸福的符号	247
章诒和	一片青山了此身 ——罗隆基素描(选段)	252
黄 波	独亲廖沫沙	257
王忠文	以新视角审视朝鲜问题与东北亚形势(选录)	259
黄 钟	成就大国心态的六个条件	261
王彬彬	今日中国的“群众性民族主义”(有删节)	266
任仲夷	关 山 任仲夷谈邓小平与广东改革开放(选录) ..	272
蔡定剑	我们需要怎样的改革家?	279
郭元晞	管工业经济的经历(有删节)	282
秦 晖	为富不仁周正毅 为仁难富孙大午	290
张思之	郭宇宽 专访张思之(有删节)	295
卢跃刚	刘天时 卢跃刚:做一个清道夫,警觉、用力地	300
黄 钟	警惕中国增长的极限(有删节)	307

陈志武	我们需要国营,还是“还产于民”(有删节)	314
秦 晖	农民中国:历史的反思与现实的选择(有删节)	322
刘军宁	凭什么不缴税?“税”的宪政解读	334
董月玲	五千年未有之破坏(选录)	338
张 鸣	教育不能承受之重	346
王学泰	李新宇 为中国文学经典解毒	351
丁 弘	谈几部纪念毛泽东的电视片(有删节)	356
沙叶新	不哭也难	360

20 世纪中国的“新道统”

——从梁启超到李慎之（选录）

何家栋

全文 14000 字。作者认为：20 世纪中国思想史上承前启后的“新道统”，其主链应是梁启超——胡适——顾准——李慎之。作者分述四人的思想。今选录有关李慎之部份：

李慎之并不认为自己是一个学问家，虽然他具有渊博的学识，却没有等身的著作。他在给友人的信中说：“我自认为我思想的‘大方向’还是正确的，但用作论据的许多事实和材料都不准确，这是因为我不但学力不足而且从头就没有决心潜心治学的缘故。”用政治家的标准来衡量，李慎之去世前只能算是半个政治家，但如果假以时日，他显然具有成为新时代政治家的潜质和气魄。然而，李慎之当之无愧地是新世纪之交中国大陆最重要的思想家。检验思想家的标准是理论的前瞻性、穿透性与说服力。能够指出世界上的真问题所在并指明前进的路径，就是世界思想家，能够指出中国的真问题所在并指明前进的路径，就是中国的思想家。我们从来没有说李慎之是世界级的思想家，但他的确是大陆目前最有影响力和号召力的自由主义思想家。

在 1980 年代，已经有不少老中青思想家和学者呼唤和阐释民主、自由，但还没有人将自己的主张冠以“自由主义民主”，正是李慎之最终捅破了这层窗户纸。他在给我的信中说：“我的看法是，当面的敌人只有一个，就是在中国绵延了两千两百年的专制主义，虽然自八十年代起它已因自身的腐烂而日趋软化，但极权的本性未

变。要救治专制主义,只有民主主义、自由主义以至个人主义,别的出路是没有的。”“其实自由主义就是资本主义,在世界上,它已越来越成为主流,苏联瓦解改制后尤其明显。自由主义在世界上存在了几百年,政策屡有变化,有的甚至就叫社会主义,如英国的工党和西欧、北欧的社会民主党。但是我们中国共产党跟着苏联共产党一贯称之为资本主义。其实并不错,因为他们不论变化多大,总是①承认私有财产存在;②承认市场竞争;③尤其重要的是无论如何不能损害民主原则。这些在根本上都是自由主义。”我在怀念慎之的文章中指出:慎之最大的价值还不在于他的文字,而是他的行为,他的身教,他的榜样作用。在1990年代初,上一个十年中的许多思想活跃分子不再能够发出声音,另外一些人开始忏悔自己思想的“西化”、“激进”,鼓吹“21世纪是中国文明的世纪”的“文化保守主义”,鼓吹反对市场化、民主化改革导向的“政治保守主义”。李慎之的特殊意义就在于,在“万马齐喑究可哀”的时候,在知识阶层的思想再次发生动摇的时候,发出了时代的最强音:坚持现代化导向,走世界主流文明之路,将自由民主确立为全球价值。由于他思想的透彻、文字的流畅、感情的真挚以及身份的特殊,使他的文章获得了最大范围的读者群与支持者。李慎之在当代中国思想史上所特有的启迪作用和消解作用,是任何人也代替不了的。

李慎之指出,顾准不但解释了许多困惑人的历史问题,而且提出了一个哲学上或者发生学上的论断:历史上许多有普遍意义的现象,初始时往往凭借许多条件很难凑合在一起的因缘而以特例发生,然后再传布而成为通例。“资本主义注定要发生在一国然后再传布于世界,由英到法-德-美-俄-日。历史上任何重大的、足以改变人类命运的变革,都是这样发生和传布的”。“以我看来,顾准的分析似乎要比后来在中国大红大紫的韦伯学说更加切实而全面。”民主也是由特例经传布而成为通例。对全人类而言,近代民主最初的萌芽毋宁是偶然的,可能与不同民族传统中的文化因素有关。而民主一旦确立以后就发生了伟大的示范作用,从而也就有了所谓规律

性。因此,根本就谈不上什么“西方的民主”或者“中国的民主”,而只有“源于西方的民主”以及“民主在中国”。在顾准的发生学基础上,李慎之补充了民主动力学的论述。在当今世界,一个国家的民主转型不仅具有内源性的动力,而且具有外源性的动力,更确切地说,是一种全球化的混合动力。李慎之是向中国思想界系统介绍全球化概念的第一人。他在《全球化与中国文化》中指出:世界已经进入全球化时代,全球化的过程方兴未艾。市场经济的全球化 and 信息传播的全球化是全球化时代最重要的标志。不管你愿意不愿意,都会被“裹胁”进入“加速全球化”(以区别于过去 500 年慢吞吞地全球化)时代。他在《全球化和全球价值》中指出:对世界上的落后国家来说,在二十一世纪要实行民主比起二十世纪来要容易得太多了。第一是因为全球化的形势,可以说是“万方民主逼人来”。坚持专制难免被鄙视,被孤立。第二是因为已经有百十来个先进国家树立了民主的范例,要学习并不困难。第三,也是最重要的是,有关实行民主的概念和实践,已经有丰富的积累而十分明确了。在各个民族国家内部实现民主的基础上,“再进一步,还有全世界范围的民主”。

非西方国家的民主化转型,对于统治者来说,可能是被“裹胁”和“逼迫”的,对于民众来说,则是自觉自愿的,热切追求的。因为民主是一种普世价值、全球价值,是建立在不分人种、民族的普遍人性基础上的。

李慎之说:民主起源于人对自己天赋权利的要求。世界各国历史上大概都有很长时期的由自称权力来自于天或上帝的专制君主或者少数有特权的贵族统治人民的时期。所谓启蒙,就是普通人对自己的权利的觉醒,所谓民主,就是人民自己管理自己而排除专制者或者特权者的统治。从一七七六年美国《独立宣言》以来,一七八九年的美国《人权法案》和同年法国的《人权与公民权宣言》就都确认:人生而自由,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每一个公民都享有言论、写作和出版自由,财产权神圣不可侵犯。公民有迁徙权、居住权、私隐权,结社权、有和平集会和向政府请愿申诉的权利,以及以后不断

增补扩大的各项权利,写入了各国宪法,写入了联合国宪章和国际公约,凡是联合国会员国的政府都有义务遵守。民主是全人类的共同归趋与共同要求。

阿玛蒂亚·森说:世界上没有哪种价值未曾被人反对过,即便是对母爱大概也不例外。我认为,如果某些理念具有普适性意义,那并不需要所有的人都一致赞同,所谓的价值的普适性,其实就是指任何地方的人都有理由视之为有价值的理念。任何关于某理念具普适价值的主张都会涉及到一些反事实的分析。特别是当人们对这样的主张尚未充分思考之时,他们未必会从中发现其价值。当考虑到一个国家尚未实行民主政治、那里的民众也没有机会实践它时,现在通常会假定,一旦民主政治在那里变成现实时,人民就会认同它。随着民主的扩展,民主制度的支持者就必然越来越多,而不是日益减少。民主制度从欧洲和美洲发源,伸展到世界上的许多遥远的角落,在那里人民积极地参与到民主政治当中去并接受了这一制度。“我一直强调,民主制度的生命力确实非常强盛,绝不是在某些地区偶然出现的个案。民主的价值之所以放之四海而皆准,其影响力最终来源于民主制度的生命力。这就是关于民主价值的普适性所强调的根本之点。任何想象出来的文化上的清规戒律,或者根据人类复杂多样的过去而假设出来的各种文明当中的预设框架,都不可能抹杀民主制度及其价值。”

中国和印度两位最重要的思想家都赞同民主是普世价值、全球价值,使所谓的“亚洲价值观”失去了立足之地。近来,甚至连“亚洲价值观”的积极鼓吹者李光耀也开始改弦易辙了。他在 2001 年 1 月瑞士达沃斯举行的世界经济论坛上说,“某些儒家价值已经差不多过时,遵循儒家传统的社会要紧随全球化的步伐前进”。李慎之认为,李光耀承认“英国殖民地的价值”(其实世界上很多人早已看出了这一点),并且声明“主动走出去满足全球化的标准”,实际上就是承认“全球价值”。李慎之说:“在民主成为全球价值的时代,个人立身处世的标准应该是全球主义与个人主义的互动”。用我自

己的话来说,广义的民主主义是一个意识形态的复合体,包括了个人主义(自由主义)、乡土主义(自治主义)、宪法爱国主义(宪政主义)和世界主义(全球共同体主义)。民主主义纵可以贯通古今(上接民本主义、民贵君轻等),横可以联合中西、南北,是当代可以获得最大共识与合法性的政治意识形态。

对于梁启超以来一直困惑中国知识分子的“鸡生蛋,还是蛋生鸡”的问题——民主素质教育与民主制度建设应该孰先孰后,李慎之给予了明快的回答。中国要否定专制主义只有两条路:一条是制度的改革,一条是进行启蒙教育。前一条如果机缘凑巧也许可以速成。后一条则必然是一个长期的耐心的过程,要急也是急不得的。这两条道路有可能是矛盾的:一方面说要民主化必须有合格的公民;一方面又说没有合格的公民就不能民主化,两者顶牛。实际的解决办法是:只有先实行制度的民主化,然后再完成子民的公民化。“历史是人干出来的,不是抠书本,讲死道理抠出来的。如果机缘凑巧中国能够迅速民主化了,可以预言那个民主大概也是很不如人意的民主。然而我们只能以此为起点,认认真真地进行公民教育,既是大刀阔斧地也是一点一滴地剔除中国人灵魂里的专制主义的毒素,使中国的民主逐步健全起来,正规起来,再在大体上实现了民主,亦即人民已取得了基本自由的条件下,完成完全的法治。”民主素质的培养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但只有经过民主政治的实际演练才能最终完成。民主制度的建设则可快可慢,革命(包括东欧的“天鹅绒革命”)了就快一点,但可能走弯路,还可能有反复;改革就慢一点,但可能比较稳当。历史究竟会走哪条路,取决于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两方面的博弈,不是一厢情愿的事。所以朱学勤与李慎之对话时说:此为“天问”,无(确定的)解。

李慎之以他的思想和人格魅力以及主动、热情、真诚、平等的待人之道,在身边汇聚了数以百计的知识界(而且不仅仅是知识界)朋友。他“有三个小圈子,一个都是 80 以上的人,一个是大约 60 到 70 的人,另一个大约 50 上下的人,每一两个月聚会一次”。此外,他还

和 40 岁上下、30 岁上下的人有着广泛的接触和联系。可以说,李慎之是大陆一二九一代人、四五一代人和八九一代人思想聚合反应的催化剂。他“一再呼吁”自己的朋友分工合作,批判古代和现代的专制主义,“研究民主的理论和制度”。他常常给周围的人出题目,指派任务,和我第一次见面之后,就给我寄来了一些材料,要我回答一个问题:二十一世纪是不是中国世纪?他最后一次命题是詹明信上海讲话得罪了他的中国门人,招来一场围攻,要我就此事写个评论,并且特意请人送来相关资料。正是基于以上的原因,人们才把李慎之称为“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领军人物”。“领军人物”和“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本身是不是矛盾的呢?这里要援引秦晖的观点,自由主义者在非自由秩序下的实践应当分为三个层次:1、维护自己的自由(不做奴隶),2、尊重他人的自由(不做奴隶主),3、反对他人之间的强制(坚持废奴主义)。在存在奴役制的条件下,第三层次是最重要的,没有这一条,他充其量只是个自由民,却不能说是自由主义者。而正是这一层实践,具有极大的难度。因为这是一种真正利他主义的斗争,一种需要真正的无私奉献的真正理想主义实践。“消极的”自由必须以积极的态度来争取,低调的制度必须以高调的人格来创立,为了实现一个承认人人都有“自私”权利的社会,必须付出无私的牺牲,为世俗的自由主义而斗争的时代需要一种超越世俗的“殉教”精神。秦晖所谓“在非自由秩序下”具有“实践原创性”的自由主义者,用李慎之自己的话说,就是“中国应当有一批‘战斗的民主主义者’”。李慎之正是在这一点上超越了胡适、顾准等前辈,成为当代中国有志于献身自由民主宪政实践的理想主义者的榜样。战斗就需要有团队,团队就需要领军人物,这是陈寅恪、钱钟书一类“自由民”不考虑也不理解的。熟悉李慎之的人都深信,如果再给他十年寿命,他的“实践原创性”肯定会更加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因此,他们才不理睬“律人而不律己的自由主义者”、“空谈而不践行的民主主义者”对他的贬低之辞。

仍然有很长的路要走

王元化

不管是什么样的知识人,我以为都应该有一种自觉其为知识分子的公共声音。公共的关怀可以是对身边事的主动的知情和热心的参与,也可以是关于文明与发展、知识与文化等大的问题的省思。现在大家都说全球一体化,其实对文明的忧虑是 19 世纪人文知识分子的老问题。恐怕这一个世纪的主流仍然是科技文明的功利主导。我们正在看到文化和教育走向商场,大学也在企业化,知识人才走向规模化大批量生产,工商由效率重新组织,教师和知识分子成为普通雇员……人们的大多数活动和形形色色的个性,正在逐渐被科技和利润之手整合为一体。科技和利润的逻辑正在逐渐成为评估一切发展进步与落后的准绳……如果是这样的话,离马克思所说的人的解放、人的全面发展、个性的充分伸展,确是还有相当远的路要走的。所以,人文知识分子特别敏感,他们对文明发展的思考,是对人的自由命运的忧虑关心。这种关心和忧虑伴随着科技的发展,是从不间断的,只不过是这样一个世纪转换交替的时刻,越是显得鲜明强烈罢了。

我不否认我对 19 世纪比对 20 世纪有更多的感情。直到今天,西方 19 世纪文学仍是我最喜欢的读物。我在精神上是 19 世纪之子,是喝着 19 世纪作家的奶成长的。在思想和学术方面,19 世纪也是群星灿烂的时代,20 世纪的文学天空似乎显得有些黯淡了。缺乏第一流的大思想家、大艺术家,怎么不令人怀想 19 世纪呢?对 19 世纪思想和学术遗产都没有很好地消化和吸收,我们的时代充满着一知半解不生不熟的东西,在这个思想和观念变成走马灯

的时代,我们容易看出 19 世纪的好处,毕竟那是一个对思想和学术充满着虔敬之心和潜心耕耘的时代。

我不喜欢用过于概括化的语调来下判断发表宏伟的概观,而喜欢从具体的文化问题下手作批评。比如现在大学的巨模化、产业化、市场化,究竟是利是弊依然很值得研究。从前的校长往往是文理兼通的,现在已经很难找到这样的人才了。在一些理工出身的校长眼中,文史哲是无用的。只重应用而放弃基础学科的培养已成为普遍倾向。至于对精深学问的探讨更是被忽视。目前学校中有许多人甚至完全不懂人文精神对人的素质培养的重要。学校里科研课题的申请,也有功利化、浮躁化的倾向,而背后的导向是只注意量的扩张的形式主义(经济上有泡沫,教育有没有泡沫化的现象?我看是有的)。这些都是很具体的问题。将来的人由现在的教育来造就,教育的品质某种程度上决定着社会的文化气质。所以人文精神在这里就有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所谓人文知识者发出声音,就包括这些很基本的关心、基本的知情权和参与权的表达。人文知识分子比较能欣赏多元立场,比较多主张个性自由发展,所以总会有一些在功利、数字、规矩和巨模的压抑之下的不同声音。

有人说 19 世纪有一种文化上的“广漠之野”,而这种精神生存的背景渐渐消失了。现在大众文化时代已经来临,过去时代的文学、诗歌、音乐、美术、哲学,这一切人文主义者奉为神明的优美事物交织而成的旧世界,正在走向边缘、破碎、消失。对于这种意见,我只能简单讲一点自己的想法。这些意见是现在很时髦的说法。但什么是时代精神?什么是新陈代谢?在文学作品和文化思想中,这是很复杂的问题。19 世纪末也像现在一样,曾出现不少能体现当时时代气息的新思想新流派,也曾经风行一时,但而今安在?在那以后,人们还是喜欢原来那些生命力历久不衰的作品。像黑格尔在他的美学中就明显地表露了他所喜爱的文学是希腊的史诗和悲剧,他甚至将它们放在莎士比亚之上。我在前几年所写的文章里可以说已经回答了这个问题:“艺术不能在古与今、中与外、新与旧之

间,作出高下之分;艺术只有崇高与渺小、优美与卑陋、隽永与平庸的区别。”(见《九十年代反思录》第190页)我认为人的需求是多样的。所谓大众文化也不能够一概而论。例如京剧原先就是底层的俗文化,是没有多少文化的百姓的精神享乐,但是后来在艺术上却有了很精致复杂的蕴涵。思想也有富于浓度的、深厚的文化传统积淀。雅和俗,不是绝对的。大众文化和高雅文化是发生着互补互动关系的,大众文化直接来自民间,带着新鲜活力,不断推动文化发展。唐宋的传奇、话本、变文,元明的戏剧,明清的小说,历代的民歌民谣,都在文学史上有过巨大的影响。清末王梦生撰《梨园佳话》,称“二十四史忽化声能语,自声入耳心通”,已经提出了这样的一种互动关系。当然,今天的大众文化与高雅文化的关系复杂得多,我们需要做细致分析。完全反精英文化的大众文化,比如以暴力、凶残、黄、赌、毒等为特质的大众文化,是需要抵制的;这些东西正在挟着电子科技和商业利润的优势,铺天盖地而来,可能会越来越厉害地弥漫于中国的广大城乡。此外,表面上并不那么有害的大众文化,也有潜在的消极意义。比如它具有商品拜物教的特征,它的标准化、统一化和同质化的生产,是排斥真正的个性和创造力的,久而久之这会生产出同质、平面的社会主体,一个以时尚为主导的社会文化中,是没有真正有深度的精神生活可言的。而商品的规律使它具有强烈的支配力量,控制和规范着文化消费者的需求。助长一元化(如市场至上等)的意识形态统治,产生着新的压抑形式。所以我赞成知识人在大众文化面前保持清醒的头脑和批判的意识,这样可以尽力去保证一个社会的发展中不至于产生太多的文化泡沫。

我对近现代知识命运的反思,集中在描述一种我称之为“意识形态化的启蒙心态”或“扭曲的启蒙心态”。大致说来,这种心态是指对于人的力量和理性的能力的过分信赖,为什么这种过分信赖甚而崇拜的心态会导致对人的自由的侵害?理性精神和人的力量,曾经使人类走出了黑暗的中世纪,但是一旦把它加以神化,又自以

为掌握了终极真理的时候,这样的人就会以真理的名义,将反对自己和与自己有分歧的人,当做异端,不是去加以改造,就是把他消灭掉。于是人性改造工程,灵魂爆发革命,洗脑就成为当然。以上所说的不过是得出了当代人经过思痛之后都能得出的结论,只是想得深一些,看出一些其他人不愿意接受的辛辣的思想教训而已。20 世纪知识人做的和想的,都在中国有极充分的体现,以中国近代思想作反思的对象,有可能产生一些具有世界普遍意义的命题。

但这并不是说知识人可以不去探求真理,放弃追求理想。我理解的探求真理的态度,仍然是一种执着虔敬诚实的热忱,是人文知识者的一种高尚的气质。我曾谈到爱因斯坦、霍金以及季羨林《留德十年》中所表彰的德国科学家,那样一种忘我的舍身、以真理作为人的最高幸福的气质,永远都不会失去光彩的。同时,历代中国知识分子疾虚妄、求真知、关怀天下,追求独立思想和自由精神,也永远都不会失去光彩的。一方面,对知识和文化的信念,对真理和道义的担当,对人的自由命运的关心,永远都是人文知识分子的尊严所在。没有这些东西就没有人文的意义。另一方面,这些信念和追求并不只是一些光秃的冲动,而是有内容的,考虑后果的,负责任的。总之,既有积极的理性精神,又对理性的限度和责任有真实了解的知识人,才是 21 世纪真正有力量的知识人。

文化事业的发展,是一个长期积累的过程。我无意对 2003 年这一领域具体的事态作出预测。上述的观点旨在表明,我们在理论上思想上及文化心态上,建设中国文化仍然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财经》世界 2003 年